

引　言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论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必推四世纪至八世纪由佛教徒发起的西行求法运动。

在众多求法者中，论成就卓越、影响深远，又必推初唐的三藏大师玄奘。玄奘的伟大，在于——

他以弘扬佛法为己任的抱负、他对理想不懈的追求。正是在这种追求中，显示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力量和价值。

他一心追求真知，绝不盲从。为了去伪存真，他以导河溯源的精神誓往佛国，写下中印文化交流最辉煌的篇章。

他热诚贯注的信仰、一往无前的气概。由此，他才能独来独往,不屈不挠,坦然面对自然、人事的各种阻难和诱惑,履危涉险,矢志不移。

他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当时激励他义无反顾地踏上前赴后继、死生不渝的求法之路，后人仍能借助他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榜样，振顽起懦，敢于冒险，勇于进取。

他兼收并蓄、圆融众说的学养。无论国内求师，还是去国求学，都能钩深致远，融会贯通，学识之高在佛学界古今无二。

他不可抗拒的个人魅力。特别是他主持曲女城大会，妙辩云飞,说法无敌,声名远播,震动天竺,在西域各国,树立了令人敬慕的中国人的形象。

他放眼四海、走向世界的胸怀。正是由于包括他在内的先驱者的努力，开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显示了中华民族开放、进取的一面。

他对外界敏锐的观察和思考。他的《大唐西域记》，真实细致地记载了足迹所及的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历史神话、艺术建筑，向当时的中国人展示了闻所未闻的天地。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事业心。尽管载誉归来，却不愿卸下重负,夜以继日,潜心译经,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永不丢失的民族感情。即使处在敬佛崇佛的氛围之中，依然保持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理性，并以民族自尊，作为自立、自持、自爱、自任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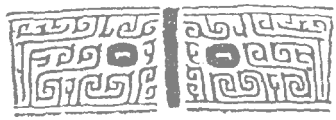
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从未想过将佛国作为自己的归宿。一旦学成，便急于归国，以开启后学，广利众生。

这就是玄奘留在历史上的不朽的形象。

这就是他留给后人的深刻的启示。

这就是今天重温“玄奘西游”的意义所在。

—— 作者 1996 年 3 月



第一章　息息相通

——中外文化交流

趋同现象

纵览东西科技文化的发展，人们惊奇地发现，其间存在着许多似乎毫无关系但又极为相似的情形：

在西方《圣经》故事中，上帝耶和华用泥土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出他的妻子夏娃，亚当和夏娃就是人类的始祖。而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类是由伏羲氏和女娲氏兄妹成婚产生的。东汉王延寿在描写鲁灵光殿时，有这么两句话“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近代出土的汉代伏羲女娲石刻像，正是这种人头蛇身的交尾像。有趣的是，在古罗马的高卢旧地，也能看到不少类似的神像。

中华民族素称炎、黄子孙。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人

身牛首”,其后裔蚩尤则是‘人身牛蹄’‘头上有角’。这种人身牛首的神，同样出现在古希腊的神话中。

据后世学者考证，中国古代的太牢（盛牲口的食器叫“牢”,大的叫‘太牢’,古人把宴会或祭祀时并用牛、羊、猪三牲,叫‘太牢’。)祭祀和春节祭祀,和古代埃及的仪式十分相似。

在天文学中，中国古代将黄道（古人想象中太阳绕地而行的轨道）的恒星分成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座，四方各有七宿),而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流域)、印度等地,也早已出现了这种理论。

中国先秦著作《管子》，谈到了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循环的影响，即它们的形体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在《吕氏春秋》中载有同样的内容。差不多与《管子》问世同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与此完全相同的话。

东汉王充在他的名著《论衡》中，已看到大海潮汐涨落对月相变化的依赖关系。在他之前不久，居住在安息（今伊朗）的迦勒底(即新巴比伦王国,在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人塞琉可斯，也坚持地球绕月说，并发现波斯湾的潮汐的周期性均差，和月亮在黄道上的位置有关。

在医学中，中国的气功疗法、古希腊的气疗法，都和古印度的医疗法非常相似。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到西汉末年已广为发展，但至三国时期便绝迹了。使人惊奇的是，在西方，解剖学也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又几乎与中国同时绝迹。

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辨基础的阴阳二元论，和祆教（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一带）以光明和黑暗为两极的说法，颇有相

近之处。而中国古人用以探讨世界本原的五行说（即以水、火、木、金、土作为构成各种物质的元素），同自毕达哥拉斯到恩培多勒的古希腊哲学家以火、水、土、气作为形成万物的四元素，又似乎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战国末期哲学家荀子曾提出从水火——草木——禽兽——人的发展进化说，而在此之前不久，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从植物——动物——人的不断进步的‘灵魂阶梯’论。二者几乎是从相同的出发点思考，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无独有偶，古代中国和希腊的两个著名的诡辩学者惠施和芝诺，恰巧也生活在同时。

印度学者曾将十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亚的史诗《王书》与作于中国明代的小说《封神演义》作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这二部作品中的不少人物，如国王喀乌斯和商纣，王后苏达拔和妲己，大将罗斯坦和李靖，以及秀拉勃和哪吒等，都十分相像。另外，在古代波斯传说中，有一个国王向天射箭的故事，这和《战国策》中所载宋国末代君主康王‘射天’之事，又不谋而合了。

上述种种类同，有的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作人类文化发展所特有的“趋同”现象。当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论及这种现象时说：“在生物进化论中，‘趋同’一词的定义是在适应环境的进程中，异体同功而非异体同形的结构必然变得彼此相似的作用。所谓异体同形器官，乃是从它们所在机体的共祖遗传下来的本质相同的结构，虽然它们在表现各种功能时可能变得很不相同。……相反，异体同功的器官虽然表面上似乎完全相似，可是在构造上是根本不同的。”趋同这个词用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会的进化上时,不一定要解释为高级的独立发明,它可能只意味着在遇到同样的较简单的问题时，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它。(《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即由于环境和人的本性对事物的可能性所施加的限制，在互相隔绝的各种文化中,有不少并行的相似的发展,由此使得人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得一些理论和发明,在似乎并无关系的民族和地区同时出现。

传 播 途 径

虽然古代没有今天那样先进的传播媒介和交通工具，但也没有今天那么多人为的阻扰，各地的交往，远比后人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除了“趋同”造成上述这些类似的状况，是否还有其他(或许是更重要、更普遍)的原因呢？

本世纪初，一个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从大海起伏不息的波涛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历史的形态，就像奔腾不息的江水，后浪推着前浪，一波接着一波。美国旧金山金门中午的潮水，同上海吴淞口傍晚的潮水，如鱼鳞一般前后相衔，如圆环一般找不到起点和终点。无论哪一地发生什么情况，都会对另一处发生影响。当然，浪潮的冲激力有大小，影响也有运有近。一个人心中的想法,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举动，影响到整个世界，这种情况到处可以看到。……人类的行为，息息相关，互相感应，就像牵一发而动全身，又像铜山在西方倒塌,洛阳的铜钟便在东方响应。(《中国历史研究法》)

秦汉之际,中原大乱,汉得天下,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都无暇、也无力对付外界的事。北方的匈奴得此天时，迅速强

盛起来。公元前 177一前 176 年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进攻原先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月氏族被迫西迁,大部分侵入塞种地区(即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不久又继续西行，大约在公元前 130 年，与来自西方的希腊势力交锋,入据中亚细亚的大夏国(又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本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来隶属于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在今阿富汗北部)建都妫水(又名乌浒水,即今阿母河），进而南达印度河流域。月氏刚脱离中华民族的羽翼，又投入印度文化的怀抱，因而很自然地成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希腊文化的交汇之处和传播中心。据《汉书·西域传》说 月氏族往西君临大夏,而塞王则往南君临罽宾(又名迦湿弥罗，在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这二句话概括了当时西域民族迁徙的动向。被月氏族赶走的塞人，一部分迁往中亚细亚的锡尔河，一部分进入克什米尔，由此和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发生关系，加速了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交往。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对促使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传播，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西方某些学者称之为“冲突的传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民族的交往、文化的传播，主要还是通过逐利的经商活动进行的,如塞人斡旋于中、印、希、波之间,目的就在于充当贸易的中介人。当宗教出现之后，那些怀有真诚的宗教信仰和献身精神、为弘扬本教不辞履险涉难的僧侣，对推进文化传播，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和其他文明发达国家的交往，

不像埃及、希腊、阿拉伯、印度之间那么密切。但交往始终存在。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就西征大戎，直达昆仑（在今西藏、新疆之间）山坡，赤水（在今青海）的南面，最后在西王母那里作客（《竹书纪年》，又见《列子·周穆王》）。关于西王母，历来有二种说法，一说是居住在昆仑山上的女神；一说是古代部族名，在极西之地，与北方的觚竹、南方的北户、东方的日下，都是偏僻荒远的国家，称作"四荒"（《尔雅·释地》）。如果这些传说都事出有因的话，那么周穆王及其随行的足迹，已远达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周穆王并不是第一个到达西域的中原人，但他用军事力量，打通了中原和西域的通道，为汉代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国王居鲁士创立阿契美尼德王朝，据说他在中亚细亚的锡尔河被杀，而传说周穆王西行恰恰也就是从这里返回中原。公元前五世纪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波斯帝国，疆域东达葱岭和印度河。虽然还未发现当时中国（东周王朝）和波斯之间有什么正式的交往，但不会没有商业来往，当时波斯文献中已出现中国的名称（叫作"支尼"），是毫不足怪的。

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举入侵东方，消灭了波斯帝国，兵临中亚细亚，帝国的疆域直达印度河。如果他再东进一步，就要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了。那时的希腊商人和旅行家，虽然未必到过中国，但知道在东方有个出产丝绸的国家，叫作"支那"。据史载，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开始和罽宾相通。罽宾地处中国和希腊人统治下的印度之间，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它很自然地成了中国和希腊文化接触的媒介。据说希腊人在印度的最后一段时期的统治，完全是靠中

国外交上的支持而存在的。汉武帝时，长安集中了四方奇物，据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两都赋》中说、有些来自三万里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在汉代的石画像中，居然出现了裸体的像。须知当时的中国人无不受封建礼教有形无形的束缚，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并且很自然地联想到希腊雕刻艺术的特色。

公元前一世纪初，奥古斯都建立元首政治，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埃及的亚历山大成了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了罗马和东方进行贸易的基地。当时中国称罗马为“大秦”，在极西之地，而罗马人也将中国看作极东之国。尽管如此，共同对物质贸易的需求，仍然推动着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通过安息等一些中间国家，进行密切的贸易来往。罗马皇帝通使汉朝，只因安息从中作梗，才未能实现两国间的直接交往。公元一世纪初，亚历山大里亚的魔术师，终于踏上了中国这片使他感到比魔术更加奇幻的土地。三世纪上半叶，中国帆船通过南印度，远达当时属于罗马的港口——厄立特里亚的祖拉湾旁的阿杜利（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马萨瓦港附近）。本世纪在麦洛埃(古代库施城市,在尼罗河东岸,今苏丹凯布希耶以北）发现了出土的中国陶器。而在中国汉中、徐州等地发现的汉代的麒麟画像，俨然就是产于非洲中部的长颈鹿。

相 互 影 响

虽然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主要是出于经济、政治上的需要，通过商人、使者、军队，以贸易、外交、战争等手段进行，但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在其间自觉不自觉地传播开了。有交

往，有传播，必然有影响。当然，每个民族都能创造自己独特的文明，并且在保持其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传统。但任何一种文明，又决不可能在丝毫不受异质文化的影响下、在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发展和进步。

当从大秦传来的比宝石更光亮、更璀璨的“水晶”(玻璃)使当时中国人眼花缭乱、赞叹不已之时，中国的丝绸在西方国家引起了更大的轰动。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丝绸开始的。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国”这一名词在欧洲首次出现，即被称为 Seres(丝国)。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出土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画“波利斯的裁判”，画上希腊女神所穿的透明、美丽的衣料，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著名的罗马统帅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上，那些贵族男女，更以能穿上中国的绸衣为贵为荣。到四世纪，丝绸业成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一个重要财源。值得注意的是，还在罗马帝国前期，当时的学者（如叙利亚作家巴尔特萨纳）就已对东方这个“产丝之国”的政治、社会、民俗，有了初步、并且大致正确的了解。这虽不是那些丝绸商的目的，但不能不说是开拓丝绸之路的最大成果。到了中世纪，甚至连中国儒家的理性主义和无神论、怀疑论，也传到被占星学和诺斯替教的迷信所统治的东罗马帝国。

蒙古人入主中原，向来被认为汉族的奇耻大辱，元朝也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落后、最黑暗的时期，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元朝却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蒙古军队的铁蹄，不仅践踏了中原的黄土地，而且还闯入欧洲的领地，这个勃兴的军事民族，将从东方到西方的文明古国，都置于同一淫威之下。紧跟着军马蹄下滚滚的黄尘，各国的商队将本国

的物品、机械、技术、文化，送往异国他乡。就在这时，中国的纺织技术传到意大利，使西方继丝绸业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飞跃。隋代李春建造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石拱桥，时隔七百年之后，在意大利的建筑中出现，决非偶然。

当然，中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中国对西方影响最大的还是“四大发明”。虽然这些发明早已从中国传出，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出击大食（即阿拉伯帝国），至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大败而归，一些被俘的唐军将士，被带到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中部城市），帮助当地人办起了造纸厂，但直到十三世纪，即在蒙古人称霸世界之时，造纸、印刷术、火药才传入欧洲，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这样评价三大发明：

> 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新工具》)

培根高度评价了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威力和影响，但他显然并不了解这三大发明是如何产生的，更不知道东方的中国才是它们的诞生地。在欧洲曾出现过世界文明一个中心的说法，即人类最初的文明、古代一些最基本的发明，都出于埃及或两河流域，从这里传播到世界各地，近代中国也有任何外来文明都为我所固有的说法。幸亏我们的先人还没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染上这种夜郎自大的习气。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也说：“要寻求学问，即使它远在中国。”(《哈狄特》)正是在不断的文化交往中，中国认识了西方各国，西方各国认识了中国。东方西方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是显而易见的，只有通过这种影响、这种学习，人们才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才能有所激励、有所借鉴，作出选择和反应，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第二章　佛法东流

——佛教在中国

佛 教 输 入

在中国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最密切的无疑是和西南近邻印度的关系。印度古名身毒，或译贤豆，又称天竺或婆罗门。远在上古时期，中国对天体的认识，就已体现在“二十八宿”之中。这种认识，同样见于公元前十世纪至前八世纪的古印度天文学中。“二十八”这个数字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因此在中、印两国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个输出和接受的关系。由此推断，早在三千年前，中、印之间就已有了来往。公元前四世纪，怀底利耶作《政事论》，已将中国称作“支那”，这二个字，还见于印度二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古印度著名的《摩奴法典》，则将中国人和希腊人、塞种人并

提。

公元前三世纪，当时正处在战国末期的中国，和阿育王统治下的印度孔雀王朝来往十分密切。据说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的于阗国，就是由一个名瞿萨旦的中国人和阿育王宰相耶舍率两国移民合力建成的。《魏书。西域传》“于阗”条说“：从高昌以西，各国居民都是大眼睛、高鼻梁，只有于阗这个国家，居民不像胡人，而和华人相似。”可见于阗和中国在种族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国后来成了印度、波斯、希腊、中国四方文化的荟萃之地。公元一世纪，大月氏的贵霜王朝统治了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北部，到迦腻色迦王继位后，在中国和埃及、罗马的贸易中，起了桥梁的作用。

公元前三世纪初，希腊作家麦伽斯梯尼奉塞琉西王之命，出使印度孔雀王朝，埃及、波斯在公元前也都已有使者到达印度。但同时的中国，对印度尚未有正式的官方来往。西汉张骞无疑是促进中国和西域各国交往的一大功臣，正是他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永远不会废弃的“丝绸之路”。中国政府知道世界上有“印度”这样一个大国，也是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得知的。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产于四川的竹杖和布匹，推知除了北路外，还可向南方从四川、云南经缅甸入印。传说阿育王的王子曾率众追赶神马到达金马、碧鸡两山之间（约在今云南大理、楚雄一带），后被阻留在云南。

古代从事对外交流的，主要是三种人：使节、商人、教徒。在促进中印交流中，佛教徒起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印交往的历史，主要就是佛教传播的过程。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二世纪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都曾派僧人到境外布教。传说东汉永平七年（64），西方天空白天出现明星。夜晚，汉明帝梦见神人。第二天请群臣释梦，博学多才的傅毅答道：“臣听说西方天竺有得道者号称‘佛’,这大概是它的神灵吧。”明帝感悟，派使者张骞、羽林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西行求佛。这时佛已涅槃，于是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回国后藏在兰台石室。同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立佛寺，并在壁上画了一幅《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

上面的说法原出西晋王浮的《老子化胡经》。王浮是个道士，他断言佛陀是老子的弟子，并编造了老子出关西度流沙的故事。牟子《理惑论》、袁宏《后汉记》、僧祐《出三藏记》等书因袭其谬说，又加以增饰。事实上，明帝在位时张骞已去世多年,在时间上显然不合。南朝梁慧皎作《高僧传》,改为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往天竺寻访佛法，在那里遇见摄摩腾和竺法兰，邀请他们一起还汉，在洛阳建造佛寺，并确指该寺即今洛阳白马寺,《四十二章经》即竺法兰在洛阳所译的经。尽管此事谬误显然，但由于后世一些佛徒和好事者的辗转附会，习非成是,竟成史实,甚至连‘手不停披百家之编’的韩愈也跟着说：“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范晔在《后汉书》中有一段颇为龃龉的话“:至于佛教，原是在身毒(印度)产生的,两汉的方志,都从未提到它,就是张骞、班超,也不曾听说过。’不仅张骞、班超不曾言佛,就是生于明帝之世、学识最称赅博的王充,在《论衡》中对佛教也只字未及，故后人又据此断言：两汉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佛教。隋代费长房说《四十二章经》原是外国经抄，后来摘要在民间

流传,就像中国的《孝经》十八章。(《历代三宝记》)后人甚至还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两晋兼通佛、道的华人所作。

但是,绝不能因为张骞、班超不曾言佛,便说在此之前,佛教与中国不曾发生任何关系。中国第一个僧人朱士行在他所作的《经录》中,说秦始皇在位时,西域僧人室利防等十八人,带着佛经来到咸阳,被秦始皇关在狱中。秦始皇与阿育王同时,阿育王在位时,曾派宣教师数百人往各地传教,其中一部分到达中国,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出师不利,遇上以焚书坑儒为乐事的秦皇,从而无声无息地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经录》的真伪尚成问题,可确信的是,公元前一世纪,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于阗和中国来往密切,当时至少已有一部分人,和佛教有过最初的接触。据《淮南子》载,大禹到裸民国时,为了表示对当地习俗的尊重,把衣服脱掉,然后进去。在佛经中,有着相似的故事。刘安及其门人编写这个故事时,或许正是受了来自西方的传说的影响。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头传授博士弟子秦景宪佛经。"这正是大月氏征服罽宾之时。罽宾为佛教极盛之地,大月氏必受影响,伊存想来就是大月氏派往中国的信佛使者。而当时的中国学子,有人因析疑解惑,从师问业,也很自然。只是这还是个人的事,对整个社会没有什么影响。

汉明帝梦佛虽属虚妄,但故事编在明帝身上则事出有因。据《后汉书·西域传》载:王莽篡位后,不断贬斥、更换王侯,西域由此生怨叛乱,和中国断绝来往,并且再一次从属匈奴。永平十六年(73),汉明帝命将帅北征。西域在绝交六十五年之后,又和中国来往。又据《后汉书·楚王英》载楚王刘英

晚年喜欢黄老之学，举行佛教的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朝廷让天下犯死罪的人，交缣帛赎罪。刘英也献上缣帛请求赎罪。明帝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法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尚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诏令中的"浮屠"即佛，"伊蒲塞"即优婆塞(居士)，"桑门"即沙门(和尚)。这是正史中最早的有关佛教的记载。楚王刘英是东汉开创者光武帝的儿子，明帝的异母弟，他以王者之尊而皈依佛教，可知当时佛教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明帝诏中"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这两句话很值得注意。汉人谈及佛教，都与黄、老并举，实际上是将佛看作是黄、老的附庸，其蔚为大国，凌迈道教，与儒颉颃，是魏、晋以后的事。

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大盛。据《后汉书·陶谦传》载，丹阳(今江苏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建佛寺，用黄金涂饰佛像，每逢浴佛（又作灌佛。传说佛陀降生后，天降香水为之洗浴。为纪念佛诞生，佛寺在每年四月八日举行法会，用香汤、水、甘茶、五色水等物，从顶灌浴佛像，同时举行拜佛祭祖、供养僧侣等庆祝活动。）的盛会，就准备了许多饮食，摆在路旁，前来就食和观看的人成千上万。从当时佛塔建造之多、佛像雕涂之贵、佛徒供养之盛，可见社会对佛教的尊重。甚至连帝王也染此习。汉桓帝在位时，宫中同时"立黄、老、浮图之祠"，成为中国帝王祀佛的第一人。

前人一般认为，佛教是通过月支、罽宾，从北方输入中国的。但也有人根据汉代佛与道的密切关系，提出：中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就对峙已久，壁垒分明。北方重现在，贵实行，是儒墨的天下；南方则慕出世，尚谈玄，是道家的土地。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